

论西方传统公益伦理思想

戚小村*

(共青团湖南省委 青农部, 湖南 长沙 410008)

[摘要] 全球性社会公益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公益事业占据社会整体道德建设系统制高点地位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从伦理道德层面研究公益事业,特别是分析公益事业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思想脉络和流派渊源,这对指导当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公益事业的伦理体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公益 传统 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115(2006)02-0056-06

所谓“西方传统公益伦理思想”,主要是根据西方自古希腊始,经中世纪到近代传统公益事业发展及其伦理思想的演进历史,选择西方公益历史传统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具有独特历史象征意义的伦理精神,表达的是具有鲜明阶段性传统特征的伦理主题。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它相信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是一种“共同的善”,并且是和每一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的宏伟事业。它需要人们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精神才能实现。应该看到,当代社会公益事业在整个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发扬中占有高端地位,是一种特殊的需要强大伦理动力的社会制度,是为达到一定公益目标和伦理理想而建立的制度实体,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对公民承担的“制度化的集体责任”^[1]。当然,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由于公益伦理(Public Welfare ethic)各理论流派分类标准模糊不清但又差异巨大,在时空和派系间呈现动态发展,彼此交错的局面;所以这种划分不是绝对和孤立的,而是辩证和动态的。比如说,西方公益事业在其发展历史上,由于其行为主体、行为对象、概念的内涵外延、行为类型等一直处于调整 and 变化之中,所谓“公益事业”(Public utility)与“慈善”(Charity)、“社会保障”(social

guarantee)“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等概念的关系经常处于混合、重叠和替代之中。又比如“公益”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几乎可以等同于“慈善”,而西方近代出现的国家公益行为直接发展成为现代福利、保障制度;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信仰及其伦理不仅是中世纪公益的典型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公益事业长期以来的核心价值之一。

一 城邦公益传统:希腊罗马时代的共同体精神

慈善在西语中主要有两种翻译:Philanthropy和Charity。英语中的“Philanthropy”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由“Philo(爱)”“Anthropo(人类)”两词根缀合而成,慈善一词的含意即是爱人类,通过个人的善举,即通过捐赠、提供服务或其他爱心活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和灾难,促进人类福利事业的发展,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而Charity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现代公益的许多原则、概念追根溯源,都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益观有重大渊源。^[2]

柏拉图(Platon,前427-347)在《理想国》中认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导致了国家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一个符合正义与公道的社会,决不应该是一个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他认为,财富是奢侈放纵的父

* [收稿日期] 2006-02-05

[作者简介] 戚小村(1973-),男,湖南长沙人,共青团湖南省委青农部。

母, 贫困是卑鄙龌龊的双亲。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为此, 他主张实行禁欲主义的“共产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的社会公益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学》和《尼可马科伦理学》两本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 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文本,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善与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 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 善对人类最终意味着幸福(eudaimonia)。亚里士多德的善, 也就是人所过的最好的生活, 对善的追求和人类的好生活而言, 德性都是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 德性的践行都是中心性的和必要的部分。也就是说, 没有德性, 也就没有人类生活的善和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 善与德性是有着普遍的社会关联意义的, 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善)的及其共同追求的共同体, 是传统德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条件。德性是在共同体内部通过其实践辩证地建立起来的。善本身是一种共同性的善, 德性则是一种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内在条件。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公益伦理观是一种共同体精神的公益观, 他主张社会公益事业要以善德教育为基础, 以公民的幸福生活和城邦的公共利益为目标, 在维护奴隶制度的前提之下, 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良, 把公民引入幸福生活的境界, 促进城邦的共同繁荣和维护其共同利益。他曾经这样称赞人的慷慨施予之举: “在一切德性之中, 慷慨可说为人最钟爱, 因为在给予中, 可以有助于人。”^[3]。而另一位大哲梭罗也表达了类似的德性观点: “慈善事业几乎是惟一受到人类倾力称赞的美德。”^[4](P135—145)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 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问题就是城邦的公民资格问题。在取得公民资格这一问题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公民致力于公共事务, 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城邦, 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5](P316), 由此换来参与共同体内的各种权利的分配。关于这一公民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指出: “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事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 在他们看来, 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此业为目的, 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极高而最广的一种, 它所求的事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 这种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的‘城邦’, 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6], 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的本性是

要求组成国家, 结成社会,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之中, 人才能获得最高的善, 过上幸福的生活。所谓城邦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在这里, 每个公民都有权力和义务参加城邦的公益事业。古罗马时代依然强调公民义务优先, 与古希腊相同的是, 它们都将共同体作为最高的善和公民个人充分展现德性的舞台。

古希腊罗马时代最著名的慈善理论家西塞罗认为, “没有什么比仁慈和慷慨更能够体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了。”^[7](P110)。西塞罗曾深刻地分析过这种捐赠传统, 他直接把慈善行为(捐赠和服务)作为公民的道德责任来论述。在他的《论责任》一文中, 西塞罗分析了人类慈善行为的根源和必要性。^[7](P117—119) 他把它归结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履行的道德责任。慈善的最终根源是“自然”为人类所制定的社会与群体的原则, 这就是以理性和语言为媒介的公正、平等和善良。“自然”创造的一切为人类享用的东西人人皆可享用。而在各种道德责任中, 个体应该担负的最重大的责任是为国家服务。国家是一种最亲密的社会关系, 它把每个公民联系起来, 因此公民提供服务的最重要的对象应该是国家。西塞罗非常赞赏个人为国家慷慨解囊, 施财于公共利益。他认为, 倘若个人行善时把钱用于修建城墙、船坞、港口、沟渠以及所有那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工程, 那么这种善行比施惠于私益的善行更加正当, 因为施舍个人只能使一个人得到一时的满足, 但是公共工程的改善会使后代获得更加持久的恩惠。他认为, 人们应当遵循“对受者有益而对施者又没有损失”的原则, 经常不断地为他人和公共福利做些贡献。“好心为迷路者带路的人, 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燃他人的火把, 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燃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7](P113—114) 西塞罗把个人的善行与个人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 慷慨行善是个人道德责任的构成要素, 它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自然法。换言之, 承担道德责任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法则。^[8]

当然, 要看到西塞罗的公益慈善是“有等差”的, 要按小共同体的本位差序格局安排“善意”, “按照社会关系的各种等级来提供帮助”^[9](P91) 另外西塞罗虽主张个人资助社会, 但强烈反对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强制个人, “不能打着国家旗号侵犯平民百姓的财产权”, 对那种“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煽动平均主义的人要予以警惕。^[9](P202—204) 西塞罗的这一观点对近代的自由主义公益观形成了巨大的影响。^[10](P109)

二 宗教公益传统:上帝的博爱精神

西方中世纪是教会统治的世纪,最能反映中世纪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特点的,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教会系统的公益慈善事业,因此人们把教会公益视为中世纪公益的典型形态。西语中“慈善(C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公益伦理思想由古代世俗主义的“Philanthropy”即人类之爱逐步转变为信仰主义的“Charity”^{[10] (P21)}。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慈善行为与宗教行为是合一的。他在《神学大全》中说:“去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作为要求来说是一种宗教行为,作为动机来说,是一种仁慈行为;保持自我不受世俗的污染,是节制行为或某种相同的美德行为。”基督教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通过自我在世俗生活中的博爱善行而赎罪,获得拯救。

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个字:“博爱”(fraternality),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爱是无可比的”,“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11]基督教认为:每个人是按上帝的样式造的,人的灵魂里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同等地无私为一切人谋利益,因为上帝是同等地爱一切人的,“神的恩典是不加区别地赐给全人类的”。^{[11] (P343)}“爱的本质,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反求别人的益处”。^{[12] (P76)}使徒保罗说:“既然现在你们有余,那么你们只有帮助那些不足的人才是公平的。”^[14]纵观基督教的公益慈善历史,可以发现基督博爱精神是宗教公益精神的核心。

基督教还进一步提出了施予神学以及“分享的原则”,号召人们效法基督,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提倡创造财富不是为了奢华的生活,不是为了虚荣心,更不是醉心于积累则富成为财奴,同时大力提倡简朴生活,主张将富余的财物与人分享。革利免等神学家还提出了“有用性原则”,提倡财富的使用应以实际需要为准,而不应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大肆挥霍。

通过基督教的一系列教义,基督教把人对上帝的爱与普遍地满足人的需要联系起来。应该看到,宗

教公益精神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方公益伦理的核心精神,宗教信仰对西方公益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中世纪的教会公益既有脉脉温情的一面,但是也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为了讨好巴结天堂里的统治者”^[13]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它罪恶的公正的惩罚,就是对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14] (P218)},基督教的公益伦理无可避免的要反映中世纪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由于基督教自身教义的逐步修正,神学体系的日益精致,基督教公益伦理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伦理思想,并长期作为西方公益事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而影响至今。

三 人文公益传统:人道主义精神

宗教的慈善道德包含了神道掩饰之下的人道主义思想,而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神道的公益道德观在不断的“祛魅”过程中隐退,而人道的公益道德观逐渐成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主线。纵观西方近代以来整个公益事业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哪门哪派,都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人文主义精神贯穿其中,或者叫人道主义,可以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道主义思潮的涌现,整个西方公益事业及其伦理面貌为之一变,焕发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质。人道主义由于作为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公益事业发展整个历史的主流核心价值,“人文公益”自然成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又一重要传统。其主要特点是:

1. 以“人道主义”精神为价值核心

人道主义(humanism)人道主义又称作人文主义,泛指一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以此来反对宗教迷信,尽可能地增大人类公益福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尽可能发挥作为社会和作为个人的作用。

人道主义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的推崇,一方面张扬了人性的高贵和人类价值与目的的重要性,从而使人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成为一种人权的要求,一种对社会、政府的公益权利。17、18世纪的政治道德哲学把人道主义当作检验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武器,并以此来挑战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府的社会政策。而统治阶级也把改善劳动

阶级的生活状况,对穷人实施某些有限的救助,当作自己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来推行。这样,以人道主义的道德动机为出发点,以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为目的的人权理论(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就成为19世纪以前社会公益福利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道德意识形态依据。在这种人权观念的支配下,对遭遇不幸的人们实施人道主义的救济,提倡举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穷人,就成为西方各国的公益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选择。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树立了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准则。人类历史已经形成了“尊老爱幼、扶弱济贫、友爱助人、和谐共存”的观念和伦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安全、归属和爱、尊重及自我表现、相同的权利与机会等等的需求,人道主义要求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在此基础上推动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求人们坚持推己及人,与人为善的为人原则,用人道的方法对待一切人。近代以来社会公益事业的转型与发展,恰恰是配合社会发展,争取在不同层次上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需要方面提供保障,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对人类的整体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而成为近现代公益事业发展的精神孵化器。

2 以“利他主义”为主要行为原则

利他主义(altruism)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道德原则和学说。源于拉丁文 aliter,意为“他人的”。“利他主义”认为人有两种本能,即个人本能和社会本能,前者表现为利己心,后者表现为利他心,只有发展利他主义这种社会情感对抗利己主义情感,才能发展出普遍幸福的社会^{[15] (R56)}。“利他主义既是天生的,也是本能的,利他主义是家庭同情心的广泛外延。那些经过竞争淘汰而幸存下来并形成现代大型民族的人们,也正是那些具有普遍同情心并近似于利他主义本能的人们。”^[13]

利他主义认为,实施慈善捐赠或志愿服务的个人,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把改善社会、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境当做自己的一种使命。^[16]这种人类使命主要产生于仁爱、同情、怜悯、慈善等利他的道德情感。“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17] (P497)}人的本性是倾向于快乐的,这些人性中的本来要求就会导致对他人的同情,进而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人性中任何

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倾向”“慈善(也就是伴随着爱的那种俗望)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一种厌恶”^{[17] (P420)}人对他人的慈善动机和道德感来自于人的天性和天性中既有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等特质,是人的本性中自然地指向他人和自己的幸福,并对他人和自己有用的性质,它是自然美德,并引导人去恶从善。爱人是一种自然美德,这种爱和怜悯心其实就是人类自爱心的扩展,它使人产生对他人的爱和关注。“我们必须爱自己,我们的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从这种情感中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18] (P289)}自爱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其本身也产生对他人的爱,对他人幸福的关注而导致利他的行为。

3 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为主要目标

追求社会的普遍幸福,一直是西方公益事业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等的公益伦理思想之中,他们均以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幸福为己任。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是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穷人,财产公有、人民平等互助、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在《乌托邦》中,莫尔说:“理性劝告和敦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那里的人都享有社会保险,救死扶伤,敬老爱幼,老人受到特殊照顾,病人受到热心照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同目前正在从事劳动的人一样的照顾。全岛的人都号召人人相互帮助,以达到享受愉快的生活这一目的,理性使人“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尽量减轻别人的贫穷和困苦,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和幸福,“要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的所得,这就尽到了博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说到:“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同时又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圣西门的社会公益主张概括起来有“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无产者福利的提高”、“保证社会的安宁”等三个方面。他并把它作为社会制度的“惟一的和固定的目的”。圣西门设计了相应的“实业制度”作为其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提出了许多天才的建议。“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切并非严格的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9] (P11)}傅立叶所

描绘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幸福、公正的和谐社会,他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中说到,“大自然的意旨是要野蛮制度走向并逐步达到文明制度;文明制度走向保障制度;保障制度走向简单协作制度”,他认为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文明必将被和谐制度取代。个人的幸福和一切人的幸福达到一致;人们自由沉浸在自己的情欲和爱好之中;欧文的“劳动公社”是他构思中的理想社会制度,他主张财富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应仅仅是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作为大家共同的财产只应当为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服务,提出消灭私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欧文在其社会公益思想不断提出的过程中,也逐步将自己从慈善家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较为真实、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近代西方社会公益精神的思想之光,成为近现代社会公益制度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公益伦理思想发展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社会公益理论的形成。“空想共产主义是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20] (P414)}空想共产主义虽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代表的是当时不成熟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21] (P282, 284)}但作为一种理想,却充满了人文关切和社会公益意识,他们积极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来设计未来理想的社会模式,从而唤起了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改革,对积极促进建立健全近现代社会公益制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功利主义倡导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价行为价值的标准,也是道德活动的唯一目的,从而指出,给他人慈善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实现途径。休谟说,“公共的功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22] (P166)}把慈善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而慈善则有利于公共利益。

在边沁看来,社会公共利益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计算得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总是一致的,总是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一致的。穆勒言称:“承认功利为道德基础的结果,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22] (P212)}穆勒同时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差异。提出快乐既有量的差别,也有质的不同。而他把快乐分为低级和高级两种,低级快乐是肉体感

官欲望的满足,高级快乐则是精神上的满足。如,为他人幸福做出牺牲,牺牲者则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幸福。穆勒号召人们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牺牲自己福利,因为这种利他的行为是高级快乐,它是对美德的向往和追求。穆勒提倡每个人为了增加社会幸福总量和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对自己的与别人的幸福平等相待。他说“功用主义的道德观确认人类有为别人福利而牺牲自己福利的能力”^{[24] (P18)}并声明“功用主义所认为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23] (P8, 33)}

应该看到,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公益事业正在全球性兴起,在建设我国的社会整体道德系统中,当代的社会公益事业占据着制高点的地位,这一历史的和当下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从伦理道德层面研究社会公益事业及其伦理思想。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谓近现代的社会公益事业及其体系,主要的还是发源于西方传统公益事业,故而研究西方传统公益伦理思想,对指导当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公益事业的伦理价值体系,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2] 秦晖,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OE/OL]. <http://www.google.com>
-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 M. Wilson The Ethics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Philanthropic Ventur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1(29).
- [5] J. 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 西塞罗,西塞罗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8] 唐娟,“公民公益行为的理论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 [9] 西塞罗,西塞罗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10]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1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M],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 [12] 路德,路德选集:下册[C],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7

[13] W. Weaver;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1967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 朱庭庭.伦理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16] 彭茹静.“利他主义行为的理论发展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3(7).

[17] 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8] 卢梭.爱弥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3]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版.

Ethical Thoughts in Traditional Western Public Welfare Morals

QIXiaoan

(The League Committee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Hunan 4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the Public utility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 utilit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 at present need us analyse the Public utility in Ethic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courses, the thought veins and the schools of the Public Welfare morals.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uti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welfare traditional morals

(上接第14页)

[参考文献]

[1] 邓才彪.浅谈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的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1).

[2] 陆九渊.陆九渊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4] William K. Frankena. Philosophic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J].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ume 6. Dighton, Ed.

ior in Chief The MacMillan Company & Free Press, 1971.

[5] Watkins, I. W., Forming a value Curriculum: Two Philosophical Issues To Consider. In David Purpel & Kevin Ryan ed., Moral Education It Comes With THE territory, 1976

[6] Power, C., Kohlberg, L., "Using a Hidden Curriculum for Moral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Digest, May, 1987.

[7]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On the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c Ethic

DENG Jian-guo PENG Bo-lin

(Hunan Educational Examination Institute,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The Dept of Politics and the Law,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c Ethic, we must combine heteronomy with autonomy, combine institution with acceptance, combine universality with particularity.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c Ethic the effect